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2.014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的证成及制度完善

胡 鹏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 但刑事犯罪低龄化的个案不能简单等同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的普遍提升。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 否则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 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法律的稳定,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对于刑事犯罪低龄化问题, 可通过扩充相对负刑事责任罪名、发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和完善保安处分制度以及设立强制亲职制度等方式予以解决。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刑事责任; 年龄起点; 犯罪低龄化

中图分类号: D9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2-0092-06

引用格式: 胡 鹏.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的证成及制度完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92-97.

On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Decreasing the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fection of Relevant Systems

HU Peng

(School of Art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ut the case of younger criminal offences cannot be simply equated wit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juveniles' cognitive ability. The minimu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be lowered. Otherwise, it is neither conducive to th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the protection of adult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law, n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ques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can be solved by expanding the crime of relati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security punishment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compulsory parental system.

Keywords: juvenile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starting point; juvenile delinquency

近年来, 刑事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现象, 特别是发生在校园的暴力、欺凌等事件, 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情感。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频发, 民众对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以2017年《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由十岁降为八岁为引子, 刑法学界关于“是否应该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问题重新诉之于众。刑事犯罪低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

收稿日期: 2018-10-22

作者简介: 胡 鹏(1978—),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科技大学助理馆员, 硕士, 研究方向为法学与哲学。

无论降低说、不变说、提高说、弹性说或“恶意补足年龄”等观点，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刑法理论，以充分发挥刑法的惩治犯罪、预防犯罪之功能，更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笔者认为，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1]因此，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与否应当从这一目的出发，论证各种学说是否有利于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之目的。

一 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观点及其不足

当前，关于应否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以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争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对此，理论界主要有降低论、弹性论以及“恶意补足年龄”等观点。降低论认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当降低，以更好地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弹性论主张将主观恶性纳入界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考量范围；“恶意补足年龄”与弹性论相类似，主张只要能够证明犯罪行为是出于恶意，就可以视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承担刑事责任。

各种观点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提出了各自理由。如降低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在众多青少年刑事犯罪中，犯罪者的年龄大多在十三岁，该年龄的犯罪案件比例持续上升，出现未成年人犯罪“十三岁”现象。第二，未成年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提高，身心较之以前的同龄人更加成熟。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在21世纪互联网革命的冲击下，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情况及心理成熟度较20世纪最少提早了2~3年。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度提高，十二三岁的青少年已具备基本的善恶观及辨认控制能力，而这种能力使得法律对他们的保护反而成为其犯罪的资本。第三，能够更好地贯彻平等原则。我国《刑法》规定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十四周岁，因此不满十四周岁但已经具备辨认、控制能力的青少年即使犯罪却可以逍遥法外，这无疑破坏了平等原则。第四，有利于未成年人更好地改造。对于未成年罪犯，我国坚持的原则是“教主惩辅”，但一味地教育与宽容往往使其变本加厉，不利于其回归社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许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虽然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但因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受到应有

的惩罚。这不仅无法树立法律的权威，更不利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约束与教化，反而使其产生即使犯罪也不用担责的错误想法，由此坠入犯罪的深渊。第五，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统一。^[3]新出台的《民法总则》将民事责任能力的下限降为八周岁，因而降低刑事责任能力有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主张“弹性论”的学者认为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难以遏制犯罪且不利于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补偿，我国一贯坚持对未成年人采取的教育、感化政策反而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伞，导致其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弹性论”学者主张取消刑事责任年龄的绝对界限，引入情节标准。例如对一些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罪犯，即使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四周岁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支持“恶意补足年龄”的学者认为：第一，该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第二，能切实解决因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导致的地域间的不平等；第三，能够有效避免刚性刑事年龄制度带来的弊端，使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受到应有的处罚。^[4]

客观而言，上述各种观点均存在合理之处，但仍有论证上的不足。以降低论为例，作为我国目前社会上呼声最高的观点，降低论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推崇，大多数学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认为，降低论仅仅是“治标”之策，看似能够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其实并不能“治本”。原因如下：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我国未成年人的发展现状不符。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较以前相对成熟，但并不代表其对自身行为有了相应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另外，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的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状况各不相同。因此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将导致地区的不平等，更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弹性论及“恶意补足年龄”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司法实践问题，但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首先，弹性论主张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上下浮动六个月，由此可以避免刚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弊端。^[5]倘若一名未成年人在十三周岁五个月犯了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恶劣，那是否又要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作出调整呢？如此一来，法律便形同虚设，同时也增加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司法公正将很难实现。再者，

法律因其稳定性才具有权威性,如果法律不断变动则无法保证其稳定性,权威性更无从谈起。另外,“恶意补足年龄”观点也会带来法律不稳定以及“主观恶性”“情节严重”之标准无法统一等问题。

二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的系统证成

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决定了刑罚的适用范围,是刑罚体系构建的关键性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司法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当下我国处于社会飞速发展的重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频爆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但是,“试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运用刑罚手段来制裁少年触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理性选择,更不是匡正我国触法少年行为矫治惩罚性孱弱的妥当路径。”^{[6]57}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主要是通过生理学、医学、法学等各方面的标准来确定刑事责任能力,这是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共性条件;但是根据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还存在本国所特有的划分标准,例如国家的具体发展状况,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保护或是惩治的不同态度等。正是因为前述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各类标准,以及世界各国发展的具体实践及趋势,当下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

(一) 刑事犯罪低龄化不能证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提升

我国的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从本质上来看,刑事责任能力是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构成的。因而,一个人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状况、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强弱就决定了其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网络时代的到来,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数量急速上升,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以前的同龄人所远不及的;同时,由于社会物质水平的提升,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较之于以前的同龄人更成熟。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突出也的确是当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情况。但是,仅因为客观上未成年人生理发育以及知识积累优于以前的同龄人,以及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突出的现实情况,就断定未成年人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明显提升过于武断。其实,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需要综合生理学、医学、法学等主客观各方面的条件,其中某一方面条件的发展,并不能证明刑事责任能力的提升;而且,当下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突出,在另一方面更是证明了当下未成年人辨认和控制能力方面的不足。另外,刑法中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其本身就较为模糊,但反映在年龄上总要有个精确的数值来衡量,这个年龄一旦确定,必然会产生争议。由于未成年人“十三岁”犯罪现象日益显现,部分“降低论”学者主张应当将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为十三周岁。仅仅一年之差,未成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虽然二者并不一定存在质的差别,但是将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降为十三周岁更具有代表性并且更为精确。但是,对此并未有明确的生理学或者医学等客观方面的论证,而且,未成年人“十三岁”犯罪现象相对于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群体来说仅仅是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就精确性而言,如若十三岁相较于十四岁显得更为精确的话,那因何不是十三岁零一天、两天更加精确呢?此外,主张“弹性论”和“恶意补足年龄”论的学者认为无论是否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只要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即作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就会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主张“弹性论”的学者认为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予以作具体的规定,而是确定一个幅度范围,可以根据罪犯的作案手段、后果及情节恶劣程度等上下浮动。因此,对于实施犯罪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与该年龄相差几天或几个月的并且将保护未成年人的本制度作为犯罪资本的未成年犯,只要危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就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与此类似,主张“恶意补足年龄”论的学者认为将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在主观上出于恶意”作为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从而使得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弹性化。诚然,弹性地适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刚性制度所带来的弊病,但是其也有可能造成司法实践的随意性与不稳定性,不一定适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状况。

（二）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即使存在生理学、医学、法学等诸多方面的标准，但其毕竟不同于对精神病人的鉴定那么标准明确，在立法层面反映出来的刑事责任年龄，体现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所采取的保护或者惩治态度的差异。保护和惩罚的有机融合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核心内容，舍弃任何一方就会摧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实质；^{[7]41-42}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社会实践具体情况的差异，在保护与惩罚之间又有着不同的权重。当今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重大时期，经济总量飞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越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城乡差距日益显著，农村大量成年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客观上造成农村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而“实践证明，家庭教育的缺失是近年来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6]58}。而且，当下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各种文化价值参差不齐，也在客观上促使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上升。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上升，客观而言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存在重要因果关系。如果仅对未成年人犯罪“痛心疾首”，并在“极度惋惜”的情况下以刑罚之，是社会将其对于未成年人的教化责任转嫁于刑法。未成年人“十三岁”犯罪现象并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若只是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应当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义务。“教主惩辅”是我国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所坚持的原则，而让未成年人为社会的过错“买单”则违背了该原则，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我国司法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存在缺失，将未成年人置于刑法范畴进行处置，在缺乏足够权益保障措施的背景之下，未成年人的权益将受到严重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以刑罚手段施加于未成年人，便是在未成年人具有相当可塑性的时期，为其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这种标签会始终伴随着未成年人的成长，这不但违背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也使其更难以重新回归社会。^[8]

（三）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

我国当下法治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

法制度构建并不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还有待强化，故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更倾向于保护的态度。但“保护”是相对而言的，是较成年人犯罪相比较而给予相对宽和的刑事处遇，宽而不纵。^[9]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采取宽缓化的处置措施，但是不可因为“保护”而放弃“惩罚”的价值。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惩罚无非是为了实现对于犯罪的预防，无论是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总不是单纯以惩罚为目的，而且我国历来坚持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教主惩辅”的政策，更是通过一定的惩罚实现对未成年人更好的保护。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惩罚应该有所限制，不应该随意扩大处罚范围，特别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相对较晚，倘若此时降低责任年龄的起点，只会扩大犯罪人范围，造成更多少年交叉感染，不利于少年的再社会化。^{[6]61}另外，通过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来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并不能有效地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同时也不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贝卡利亚曾说过：“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0]当今社会的未成年人心理并不成熟，尤其是十四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并不具备相应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其无法真正理解刑罚的含义。诚然，当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刑法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确定为十四周岁的情况下，大量十三岁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对于法律权威的伤害，还是对于社会情感的伤害都是极大的。但是，如若以此为由，便主张将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就存在着为了施加刑罚而刑罚的嫌疑。目前我国的监狱存在着监管人员数量紧缺、教育人员工作繁重、监狱设施落后等诸多问题，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势必会有大量未成年人被收监，既有的刑罚执行条件能否负担起相应的教育改造责任不无疑问，监狱“交叉感染”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对未成年人重塑的困难。若是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将刑罚施加于辨认和控制能力更为欠缺的未成年人，刑罚目的能否实现也将存疑，由此一来，又谈何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

（四）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有自身的独特性

从现代国际社会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

的立法及相关政策来看,犯罪低龄化趋势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是这绝非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大势所趋,因此应当降低我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诚然,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不宜过低几乎是国际共识,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曾通过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则便指出,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该规定得过低,应当同时考量未成年人的情绪以及心理成熟度等问题。在当今国际刑事法治的发展过程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74]例如法国、日本均加重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738]但是都是建立在其国内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而这是我国当下司法实践所不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纵观世界,以十四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家占大多数,例如意大利,根据该国刑法典,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被推定为完全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逐案作出判断。这表明,我国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与很多国家有着共性,不应贸然降低。^[11]其次,部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过低的国家有适当提高的趋势,还有部分国家虽然未提高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年龄进行了提高。例如泰国刑法典规定以七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但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审理时却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犯罪人不予判处刑罚;埃及、菲律宾等国家也有相似的规定。^[12]故而,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更应该立足于自身相关司法制度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可盲目效仿少数国家的相关做法。

三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完善措施

尽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缺乏一定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完美无缺,对待未成年人“十三岁”犯罪现象只能听之任之。相反,应当分析犯罪低龄化的成因并采取相应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是应对犯罪低龄化的良策。

(一) 扩充相对负刑事责任罪名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通过封闭式的列举方式对相对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作了规定,这是

可取的,但也应相对扩大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罪名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实施犯罪的手段也日趋多元化与成熟化,现有的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罪名范围无法将诸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囊括其中。例如我国一直严厉打击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较为严重的爆炸罪等,这类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未成年人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如将其排除在外则会造成对此类犯罪的放纵。

(二) 发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于已经犯罪的人,是通过将犯罪者置于社区内并经相关组织的帮助教育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由此可见,未满十四周岁的犯罪人并不适用于社区矫正,但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应予扩大,将未满十四周岁的犯罪人列入其范围之内。与仅接受家长的管教相比,社区矫正制度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回归与成长。我国社区矫正仍处在起步阶段,没有针对不同犯罪群体提出的不同矫正方式,并且缺乏法定的矫正机关和具体的矫正程序规定,这使得在实践中存在灰色地带。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未能有效地整合国家、学校和家庭三重资源,未能很好地突出学校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的作用。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回归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完善此种制度确有必要。

(三) 建立和完善保安处分制度

对于青少年犯罪,既然我国始终坚持“教主惩辅”的政策,那么相应地,我们也要致力于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以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代替刑罚,既可有效避免监狱交叉感染等问题,又可保护未成年罪犯的身心健康。^[13]目前,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使用较多的保安处分为刑事保安处分,包括责令管教等。刑事保安处分一方面有利于对犯罪行为的预防,但同时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可操作性较弱;实际运作较为随意,合理程度有待提高;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等。由此可见,发展完善我国现有保安处分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非刑罚化予以规范化,无疑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然举措。

(四) 设立强制亲职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带着深刻的社会印记,是整个

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从社会出发探索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措施尤为关键。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实施犯罪是由其与社会关系纽带的强弱决定的。如果这个纽带足够强大，其就无法放任自我、肆意实施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也和其与社会联系的薄弱密切相关，大部分未成年人尚未踏入社会，其与社会的联系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家庭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家庭关爱的缺失往往成为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我国虽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可采取训诫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甚少且效果不明显。强制亲职制度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世界上许多国家致力于该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完善，如德国专门设立学校向父母讲授如何关爱子女以及如何成为合格的家长等；日本设立了亲子剧场，同时向父母和子女开放；美国通过特殊的测评方式，对父母的教育水平进行考核。上述国家的举措对我国强制亲职制度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4] 设立强制亲职制度不仅能加强父母的责任意识，帮助犯罪的子女更好地回归社会，更能促进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增强其与社会的联系，从而降低犯罪率。

参考文献：

[1]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M]. 邓正来，

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9.

- [2] 郭大磊.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应对：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借鉴 [J]. 青年研究，2016(6)：58.
- [3] 林清红.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宜降低 [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1)：28-34.
- [4] 山茂峰. 关于恶意补足年龄适用的探讨 [J]. 法制博览，2016(7)：194-195.
- [5] 周炳宇. 别再让“年龄”成为“过错”的理由：试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弹性实施 [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7，23(3)：31-34.
- [6] 武良军. 触法少年行为矫治的惩罚性及其实现路径 [J]. 青年研究，2018(1).
- [7] 王 娜，刘姿媛.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1).
- [8] 姚建龙. 转型社会的青少年控制 [J]. 社会科学，2012(4)：63-73.
- [9] 崔志伟. 保护与惩治之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与类型区分 [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1)：41.
- [10]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M]. 黄 风，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2.
- [11] 黄 风. 意大利刑法及其新近的发展 [M]// 最新意大利刑法典.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8.
- [12] 李育兵. 浅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降低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4)：53-58.
- [13] 周 雄. 收容教养制度研究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2)：57-66.
- [14] 赵芷艺. 幼儿园亲职教育的行动研究 [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责任编辑：徐海燕